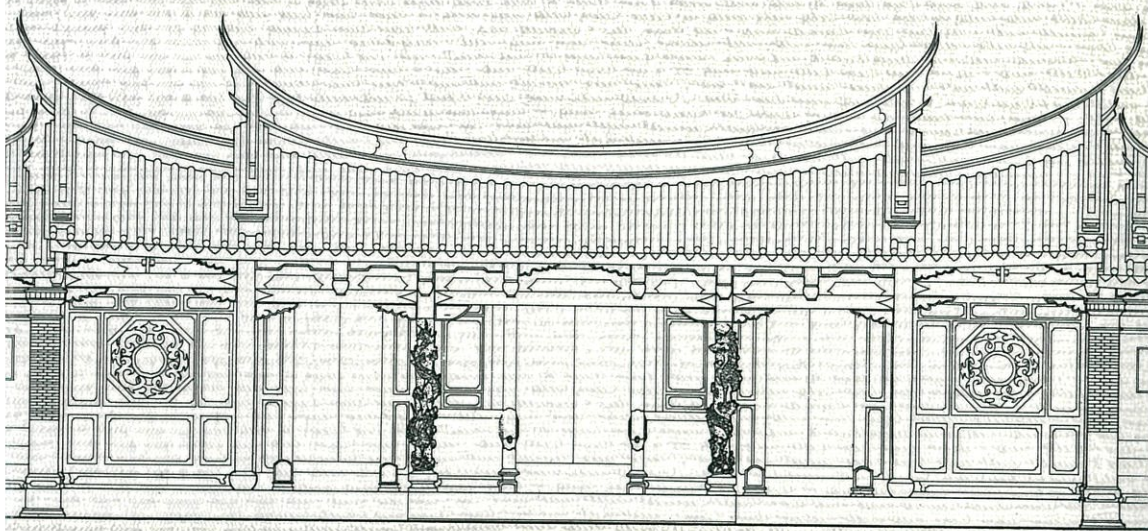


# 臺灣建築史之研究

## 原住民族與漢人建築

黃蘭翔 著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 目次

導 言 .....	ix
第壹部 序論 .....	1
1 回顧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幾個議題 .....	3
2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臺灣建築史學界——以原住民族建築的 調查研究為中心 .....	37
第貳部 原住民族基層建築文化 .....	65
3 從廣域性觀點看達悟族建築的諸項特質 .....	67
4 干欄構建築在臺灣分布的範圍及其脈絡關係 .....	131
5 臺灣漢人建築「燕尾」翹脊之起源及文化初探 .....	199
第參部 臺灣漢人的建築文化 .....	241
6 關於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及其形態的特徵 .....	243
7 從漢人「宗族倫理風水觀」看臺灣的傳統民宅 .....	307
8 臺灣傳統建築的「內木構外土牆結構」 .....	351
9 清代臺灣傳統佛教伽藍建築在日治時期的延續 .....	439
第肆部 臺灣漢人的築城與坊里 .....	515
10 解讀清代地方志中的臺灣城牆之記錄 .....	517
11 清代臺灣「新竹城」城牆的興築 .....	547
12 臺南十字街空間結構與其在日治初期的轉化 .....	581



第伍部 臺灣漢人的傳統店屋與村鎮	609
13 臺灣店屋的歷史溯源及其在近代都市改造下的轉化 .....	611
14 九二一震開的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老街的故事——隱而不顯 的土地共有問題與其在重建中的解決 .....	663
贅 語 .....	739
引用文獻 .....	755
圖片出處 .....	779
索 引	
文獻索引 .....	791
人名索引 .....	796
建築詞彙索引 .....	798
地名、事件索引 .....	805

## 0.1 解析臺灣歷史建築的四重文化觀

在1980年代以前，若提起臺灣建築史，浮現在腦裡的圖像大部分是漢人的廟宇、衙署、書院、民宅，或是城牆、門樓等建築。然而，近年來就著者在大學裡開設臺灣建築史課程時，修課同學們的興趣，明顯擴及到「近代建築」與「日式住宅」的範圍，這當然是在80年代後半以來，臺灣政治、社會與學術環境的改變及相關專業者致力於調查與研究使然。

然而，直到目前為止，還未出現對於臺灣原住民族建築感到好奇，從事專業研究的學生。關於臺灣建築史，於昭和23年（1948）有藤島亥治郎所撰寫的《台湾の建築》專書出版，該書也在民國82年（1993）被翻譯成中文版，書中對原住民族建築的描述佔有近3分之1的份量。對照二次世界戰後的臺灣建築史先驅者李乾朗的《臺灣建築史》，雖然該書特別分出數頁敘述荷西時期與日治時期的建築，但對原住民族的建築並未論及，而《台湾の建築》卻完全沒有提及二戰前日人在臺灣所興建的建築。相對於上述的著作，田中大作於1950年著述完稿，於2005年問世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就從原住民族建築、漢人建築、西洋人建築與日本人的建築四個層面，述說臺灣的建築史。

但是，即使是田中大作的論著，對於臺灣建築文化的四重性，仍只是4種類型文化不相干的並列方式陳述，沒有論述各文化間的交互影響關係，更遑論欠缺一體性的建築史觀。在1993年，著者向日本京都大學提出的博士論文《臺灣都市之文化性的多重性格與其

歷史性的形成過程》，當時並不特別意識到田中大作及藤島玄治郎兩人的臺灣建築史架構，但無可否認著者受到了他們的影響。博士論文的嘗試雖然不很成功，但其背後就是企圖論述漢人聚居於原住民族部落的基址上，逐漸建造具有清代地方性的城牆都市，後來再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都市規劃政策之過程。亦即視原住民文化為臺灣建築都市之基層文化，進而討論漢人移民與西洋人的都市建構，最後討論日本殖民政策對臺灣都市的影響與新的都市規劃等課題。

將這4個面向的分析觀點化為研究議題，是於1995年學成回國，以〈回顧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幾個議題〉為題，進行對臺灣百年來的建築與都市史研究的回顧性文章。本書將該文收錄於第1章。當時提及的議題有臺灣原住民族建築、漢人的傳統聚落與都市、漢人的傳統店屋建築、漢人的傳統匠師及營建尺寸與施工、「中國古典式樣」建築、近代建築、殖民都市等項，但是該文沒有觸及臺灣建築不可或缺的合院住宅、風水論述等重要問題。然而如今重讀該文令自著者訝異的是，撰文當時並沒有針對各議題研擬具體的實踐計畫，但是今天在本書所收的論文，卻宛如回應了該文所提及的幾個課題所作的深入思考之成果。雖然西洋人、日人在臺留下的建築，無法與原住民族、漢人的建築傳統作截然劃分，但因研究課題過於龐大及還有部份課題仍待整理與釐清，因此不收錄於本書，待後續有出版計畫再來詳細陳述其間的關係，本書先行針對原住民族與漢人的建築文化進行論述與分析。

在原住民族建築方面，當時指出臺灣原住民族建築與東南亞間的密切關連性，在本書第3章〈從廣域性觀點看達悟族建築的諸項特質〉（下文簡稱〈達悟建築〉）與第4章〈干欄構建築在臺灣分布的範圍及其脈絡關係〉（下文簡稱〈臺灣干欄建築〉），企圖打破過去以臺灣島為限制的原住民族建築之思考。雖然過去有平埔



族建築研究的前輩李亦園，指出了平埔族的高土臺建築與南島語族（Austronesia）的密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玻里尼西亞（Polynesia）等大洋洲民族的關連性，但是著者嘗試的是隨著黑潮文化的傳播，討論蘭嶼島、臺灣東部與北部的原住民族建築與東南亞間的關係。

著者所持的「原住民族基層文化觀」，除了重視原住民族建築與大洋洲、東南亞各地建築文化的關連性外，特別要指出的是今日分布在長江流域以南、東南亞與臺灣各地的漢人建築，所表現出的特殊文化之背景特徵。亦即，在西元紀元前，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一帶，在中國境內存在漢化以前的干欄構建築文化，閩粵漢人建築也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而成的成熟文化。本書第5章〈臺灣漢人建築「燕尾」翹脊之起源與文化初探〉（下文簡稱〈燕尾翹脊〉）所作的嘗試，就是以這種觀點所作的論述。在此可以非常粗略的概括其結論，認為臺灣原住民族、東南亞各種族與江南地區在古代民族，或是當今的中國南方少數民族之間存在建築文化的共通性。若是這樣的論述可以成立，那麼原住民族建築文化與其他3個文化特徵的建築，就不再是不相干的並列關係，因而可以稱其為名符其實的臺灣建築之基層文化。

讀者必定已經注意到，在〈燕尾翹脊〉將臺灣與中國閩粵地區的建築文化視為一體的前提條件。這在過去的研究裡已經逐漸得到證明，如李乾朗曾提出臺灣漢人移民建築的特徵，亦即從泉州、漳州、福州以及客家與潮州等原鄉地域，將各地原鄉的建築風格導入臺灣，或是在臺從師學而有成的匠師所興造的匠派學說。然而隨著近年來的研究，開始明白原鄉地的建築也存在著多樣的面貌，並且臺灣漢人建築的特徵之形成過程也逐漸成為被關心的焦點。還有，閩粵與臺灣漢人建築的討論也不再僅限定於臺灣與原鄉地為範疇的

論述，也開始注意到同是移民定居地的東南亞的華人建築文化。過去的臺灣漢人建築的研究，不是無法跳脫個案的資料收集，就是僅僅重視建築形態移植自原鄉地的靜態性探詢，而忽略了「建築形態」或其所代表的建築文化之起源與形成過程的思考。

關於臺灣與中國閩粵間的關係之研究，在第6章〈關於臺灣客家建築的根源及其形態的特徵〉（下文簡稱〈客家根源與特徵〉）就是以客家建築為例，思考臺灣在地客家語族建築與原鄉地間關係的論文。其最重要的發現是客家原鄉地建築有「圍龍屋」、「五鳳樓」、「土生樓」與「贛南圍子」等多種多樣的形態，以及討論在臺客家建築與其他出身地域間的建築異同性。而第7章〈從漢人「宗族倫理風水觀」看臺灣的傳統民宅〉（下文簡稱〈風水性臺灣民宅〉）與第8章〈臺灣傳統建築的「內木構外土牆結構」〉（下文簡稱〈臺灣建築的土木結構〉）基本上雖與〈燕尾翹脊〉的問題意識相同，都是在思考閩粵地區建築的形態與建築結構的形成過程。然而後者僅重視在原住民民族基層文化上的漢人建築特徵，前者則將焦點放在中國建築史脈絡下的閩粵與臺灣漢人建築形態與結構特徵的解析。第9章〈清代臺灣傳統佛教伽藍建築在日治時期的延續〉（下文簡稱〈臺灣佛教的延續〉）雖也稍稍論及日治時期的佛教建築，但最關心的還是解析清代臺灣興建的佛教寺院之建築特徵與在殖民地統治下的變遷。第13章〈臺灣店屋的歷史溯源及其在近代都市改造下的轉化〉（下文簡稱〈臺灣店屋的歷史〉）則是以漢人的傳統店屋為例，討論中國閩粵地區與臺灣、東南亞城市內的華人店屋建築之特性。

除了上述各章節將臺灣漢人建築的思考範圍擴及到中國建築史的討論，也將同是閩粵移民的移居地之東南亞納入臺灣建築史的討論範圍內。至於收錄於本書的其他各章節則將焦點放在臺灣島內自身，思考漢人建築與都市所擁有的形態特徵。例如第10章〈解讀清

代地方志中的臺灣城牆之記錄》(下文簡稱〈臺灣城牆〉)與第11章〈清代臺灣「新竹城」城牆的興築〉(下文簡稱〈新竹城牆〉)著重於究明清時代臺灣城牆的形態問題。而第12章〈清代臺南十字街空間結構與其後來的轉化〉(下文簡稱〈臺南十字街〉)與第14章〈九二一震開的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老街的故事——隱而不顯的土地共有問題與其在重建中的解決〉(下文簡稱〈永平街的故事〉)則側重在分析臺南的里坊劃分及臺灣鄉鎮街道形成之自然演變的性格。

綜而言之，本書《臺灣建築史之研究：原住民族與漢人建築》，與另外計劃將於未來幾年內出版的《臺灣建築史之研究：日治時期新建築的導入與傳統建築的轉化》，暫定是以原住民族基層文化、閩粵與臺灣漢人文化、西洋殖民文化與日本殖民文化的4個觀點，長期解析臺灣傳統建築與都市歷史的成果。如前文所述，將臺灣建築分成4個部份的論述是受到前人藤島亥治郎與田中大作的影響，但著者與他們不同的是，除了思考各個文化本身的特質外，也著重在4個文化間的互動聯繫與時代先後的發展脈絡關係。著者思考的地理範圍不以臺灣的政治版圖範圍為限，擴展至與臺灣建築文化有關的中國、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日本的沖繩都是本書所關心的範圍，也是著者於1995年留日回臺之後，企圖打破學術上的臺灣島邊界想法的實踐過程與結果。

## 0.2 研究方法

雖然臺灣有不少歷史學者認為建築史僅討論「建築形式」過於狹隘，但是本書最有興趣的題目卻仍是圍繞在建築形式的相關思辨。臺灣的建築史學通常是出身於工學部建築學系的專家負責推進，這說明臺灣建築史本應著重在建築形態與技法應用之科學。但



實際上，臺灣建築史的研究卻著重文史資料的收集，或是套用外國建築史觀點者多，幾乎與建築設計之應用脫節。建築史的相關知識僅被應用於古蹟修復或是仍限於傳統寺廟的設計範疇內，反觀19世紀以來的西方或是日本等先進國家，其建築史的研究，除了應用於古蹟修復外，也在新建築的創作思考上扮演了不可取代的角色。其實，臺灣的問題不在於建築史學應隸屬於那一學門領域，而是生長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缺乏自身對歷史文化上的定位與傳承意識，無法讓臺灣建築史的發展獨具一格，或可說存在嚴重的缺陷。

基於這樣的問題意識，本書不直接以應用歷史建築元素為目的，也對從國外引進的理論在臺灣之應用沒有太大興趣，本書的撰寫僅出於簡樸的發問，亦即當今我們所處的環境，是經由什麼樣的過程發展出來的發問開始。儘管如此，本書最大的著墨仍在「建築形式」意義之解讀。換言之，重點在於建築實體形態及其空間配置所述說的歷史與文化之討論。舉例而言，有如同〈燕尾翹脊〉文中所討論的燕尾形式背後的意義，或是〈臺灣建築的土木結構〉中所關注的建築結構形式，及其所代表的異文化交融互動的關係。這種不拘泥於工學部的應用科學，或是各個學術領域的分界，也表現在其他各章節的討論，只要與實體形態與空間配置有關的學問領域或是歷史資料，都是著者分析思考的材料。主要據為憑藉的分析材料有考古出土文物、漢籍古文獻、前人的調查報告，以及現場調查所得的資料，在解析形態意義的時候，則經常使用比較辯證性的研究方法。

所以書中所分析的對象，基本上都是以實質存在，或是已經消失但曾經存在過的物象為對象。因為這些物象與痕跡都有存在的特定地點，所以著者重視親自用身體去現場知覺與收集各種現場的資料，即使曾經存在過的物象形體現在已經消失，其原有建築所在的

時間與空間之地點體驗也是重要的經驗。但是在此必須說明的是，人的知覺常受主觀經驗意識所左右，所以必須廣收考古資料及古時候的歷史文獻以加深其時間的向度，驗證分析事象的主、客觀之可能演變過程。還有，要掌握一地點的事象及其發展，若能擴及其周邊，或是進行不同地區的比較，則更容易凸顯當地的建築形態的特殊性。這就是著者所謂的比較辯證性的研究方法。

在留學日本回臺後的這18年研究生活中，一方面加深時間向度的挖掘，如臺灣原住民族建築文化的理解，另一方面從事臺灣周邊地區的田野調查，嘗試掌握發生在臺灣的建築文化之分布範圍與其在各地的變貌情況，以期明白臺灣建築都市文化的真實面貌。

進而言之，著者從事臺灣建築與都市史的研究，最終的目的在於理解自己的生活空間的形塑歷史，找出臺灣的都市建築在東亞、東南亞、亞洲甚至世界上的時空之定位。換言之，也就是在南島建築、漢文化體系、日本殖民建築、15世紀以來大航海時期的西洋殖民，以及西洋現代建築之各種文化體系交作下，定位出臺灣建築的位置。在此要特別再次強調的是，要深入瞭解臺灣建築則必須擴展視野，對於南島建築之傳統，漢文化建築圈的基層結構，日本殖民地建築的移植與整編臺灣在地建築之過程，以及西方現代建築在臺灣的轉化等課題要有廣泛的認識與研究。

## 0.3 臺灣建築與都市歷史的幾個文化層面

### 0.3.1 基層的「原住民文化」

這裡所指稱的「原住民文化」是構成閩粵地區建築之基層文化，這並非只是針對戰後臺灣原住民族的論述，而是以寬廣的視野，將臺灣原住民族視為南島語族，或是古印度尼西亞民族之一部分。根

據過去史前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等部門的研究，認為包括平埔族在內的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語族，甚至認為臺灣是南島語族的可能發源地之一。對建築文化史的研究者而言，曾經存在於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的建築文化之共通性，自然與臺灣的南島語系種族建築文化論述脫離關係。

從建築的角度來看，在西元紀元以前，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一帶，普遍存在漢化之前干欄構建築的共通文化。從古至今，各地的建築文化經歷複雜的變遷過程，今天有的受到近代文明的洗禮，有的甚至還保留著原始狀態，呈現出種種不同的實質面貌。本書稱這種整體的文化內涵為「原住民族基層文化」。在這樣的思考方式之下，閩粵地區、東南亞、甚至包括沖繩群島在內的區域，都屬這種命題所關懷的範圍。

使這種討論閩粵漢人建築特徵的方法有其真實性，1972年在浙江省餘姚縣河姆渡遺址的發現，以及雲南省晉寧石寨山銅器、江西省清江縣盤營陶器等考古資料的陸續出土，讓長江流域以南的建築論述有一新的發展，閩粵與臺灣傳統建築是古代中國南方建築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是其論述的核心部份之一。換言之，原來從中國長江流域以南曾經存在過的非漢族建築，後來逐漸結合南遷而來的強勢中原文化，或被漢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成熟的地方性之建築文化。而這個漢化前的原住民族建築，經由考古學者與民族建築史學者的努力，逐漸建構出一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具象建築文化假說。亦即從長江流域以南至東南亞，普遍存在「長脊短簷」的「馬鞍式屋頂」，並且屬於干欄構之建築。原來是純「木造建築」，後來受中國北方夯土「土造建築」之影響，融合形成在本書中所述之「內木構外土牆」的建築結構，這也可以視為閩粵與臺灣建築之所以有木造穿鬥式建築特性之背景原因。



雖然長江流域以南與北方黃河流域的相異性，過去一直都是中國學研究者關心的議題，但是從建築學的角度論述倒還不是顯學。著者在撰寫〈燕尾翹脊〉論文時，即以建築的觀點，整理考古出土的資料、古文獻及越南的田野資料，提出燕尾屋頂的出現與原來鋪設於基層的原住民族干欄構建築文化應有傳承之關係。於2002年11月初，藉著前往福建武夷山市參加「中琉歷史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參觀了閩粵王國在漢時期所建的王城遺址，發現主要的宮殿建築形態屬於干欄式建築。這也藉以知道，漢化前確實存在所謂的干欄構基層文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臺灣島面積雖小，但生活其上的原住民族建築文化卻是超出想像的複雜。若說臺灣原住民族固有的建築形態都屬干欄構建築，這是不符合事實的言說。然而臺灣原住民族與東南亞原住民族、或是與南島語族的大洋洲間的建築文化之比較研究，確實是今後臺灣原住民族建築研究無法逃避的重要課題。

本書收錄有關原住民族基層文化的文章有3篇，亦即前述的〈燕尾翹脊〉與〈達悟建築〉、〈臺灣干欄建築〉。在〈達悟建築〉裡推論蘭嶼建築是從共通於南部平埔族、分布於密克羅尼西亞與玻里尼西亞的南島語族，以及印尼龍目島（Lombok Island）的撒薩克族（Sasaak）的平臺建築變遷發展之結果。但是在〈臺灣干欄建築〉則修正蘭嶼的建築為從原有的干欄構建築形式發展後的結果。後文發表於2002年，後來知道田中大作著書《臺灣島之建築之研究》也懷疑達悟族建築是從干欄構演變而來，這令著者備感高興，尤其是在可被視為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之父的千千岩助太郎著書《台灣高砂族の住家》裡，稱其為「豎穴居」住宅形式的情況下，因為持這種看法的人不僅是著者一人之見而已。進一步，〈臺灣干欄建築〉基於日治時期在臺的日人史前學家、考古學家、人類學家、語言學家、民族

建築學家留下了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料，再加上今天的蘭嶼島上仍存在達悟族的傳統建築可供作實地調查，也進行了巴丹島上的田野調查後完成的論文。這篇文章進一步強化了建築文化研究者也可以參與南島語族文化的論述。

### 0.3.2 臺灣漢人的傳統建築

在臺灣對漢人建築之研究風氣，在1970年代的後半與1980年代最爲興盛，在當時不滿現代建築的思潮之下，逐漸興起世界性的近代建築與本土文化的結合運動，臺灣自然也不例外，也興起歷史建築的研究與保存熱潮。除了這股熱潮之外，還必須提及另一個時代背景，當時臺灣與海外的聯繫網絡並不順暢，臺灣與中國間的往來更是處於完全中斷的狀態。因此，當時國內的建築史學者菁英不一定對臺灣建築史感興趣，但受限於無法直接前往中國從事田野調查，便將臺灣建築當作代替的研究對象。即使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當時先行的研究者們所耙梳、開創的研究架構或是問題意識，即使放在21世紀的今天，仍然有些是有效的課題。例如：關於臺灣與其移民原鄉之閩粵間的建築文化關係，也就是李乾朗所提出的匠派問題，在歷時20餘年之後，仍是方興未艾的古典課題。

但奇怪的是臺灣建築史中的匠派問題，並沒有因進入90年代臺灣與中國間的來往頻繁而有明顯的進步。近年來僅有少數幾篇碩士論文提及泉州與臺灣店屋之相關分析，以及單篇論文討論匠師或是臺南三山國王廟建築的潮州特性。倒是近年來因爲客家族群在政治上的復權現象，而帶動客家文化尋根式研究的活絡，因此以客家建築樣式源流爲中心的討論，讓臺灣與福建、廣東、江西等地建築之比較研究有了些許的推進。目前似乎僅能期待客家研究能作爲切入點，思考臺灣與福建、廣東等地建築關連性之問題。

著者個人曾在1998年，參與了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等主辦的「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客家與當代世界」會議，也由此開始了客家建築研究。把當時所思考的結果整理成〈以「風水」觀點論客家人的住家環境〉（收錄於《聚落、宗教與族群關係——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2000.12，頁153-90）與〈風水中的宗族脈絡與其對生活環境經營的影響〉（收錄於《臺灣史研究》4 (2): 57-88）。後來中斷了近10年的時間，又於2007年，因有機會參與由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莊英章主持的「臺灣客家族群的聚落、歷史與社會變遷：以鳳山、頭前、中港及後龍四河流域為範圍之跨學科研究」整體計畫，讓著者重新思考臺灣客家建築特徵及其與中國客家原鄉間的關係。

著者在〈風水性臺灣民宅〉文中，繼承了前述兩篇關於分析客家建築特質的觀點，亦即重視倫理秩序，長幼尊卑，一脈相承的「宗族倫理風水觀」，以作為普遍漢人三合院建築、漢人墳墓以及墓塋型土地公的形式理論。並且從臺灣客家人的祖籍大多屬於中國粵東，以及粵東建築之圍龍屋形制、在背側設置化胎、神明桌下設土地龍神等特徵，證明臺灣客家建築傳承於粵東的歷史事實。這篇文章也進一步推論，從祖先崇拜的墳墓、明間正廳的祖先牌位至專屬祖先祭祀的家廟，在建築空間機能分化的概念下，論述中國的人格神之廟宇建築，其建築之出現是由原始的土墳為基礎的發展，其次增設拜殿，後來於拜殿內設置牌位以代替墳墓的祭祀，其次將設置有象徵牌位之拜殿與土墳分開而獨立。發展到最後階段，那獨立的拜殿，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廟宇建築。以上的推論，也是該文重要的結論之一。

有了〈風水性臺灣民宅〉文章中所得到的論後，又整理出〈客家根源與特徵〉的論文。這篇文章主要探究為何客家建築與閩南泉州、



漳州建築如此相似的問題。首先，回溯臺灣客家人原鄉——粵東建築在客家人密集分布區內（閩西、閩西北、粵東、贛南）的建築特徵，發現各地域其實存在互不相同的建築形態。如粵東以「圍龍屋」為主流，閩西則以「土生樓」與「五鳳樓」為特徵，贛南以「塢堡圍屋」為當地的建築風格，閩西北地區則有所謂的「九廳十八院」作為其典型的建築形式。所以臺灣人的祖籍地粵東的圍龍屋建築，僅是多種客家建築樣式裡的一種而已。

更進一步，追究了具有濃厚的防衛特色之閩西土生樓與贛南塢堡圍屋的出現年代；結果發現這種建築樣式之出現並沒有想像中的古老，似乎僅能上溯至明代。更有趣的現象是客家人極為重視的祖先祭祀卻不在土生樓內，而是另外興建一棟獨立的合院建築作為祭祖的祠堂。該文又透過比較五鳳樓與閩南的泉州、漳州的建築，知道其規模或有大小，而基本空間配置與倫理次序有一致的作法。還有，若暫置圍龍屋背後的圍屋以及九廳十八院與土圍的外圍不論，粵東圍龍屋、福建汀州的九廳十八院及贛南的土圍建築，其實在核心部分都存在共通的「三堂兩橫」的典型空間配置與長幼有序的建築樣式。這種「三堂兩橫」式的建築同樣也被以漳州為祖籍地的新北市板橋區林家三落大厝，或是以泉州為籍貫出身的臺北市林安泰宅，或是以客家住宅為名的屏東縣佳冬鄉蕭宅等所採用。換言之，以不同祖籍為背景的中型以上的建築擁有相同排列的建築樣式。簡言之，明代以後，在粵東、閩西、贛南或是其他地區，雖然各自發展出不同的建築形態，但是在明代以前（或是更早的時期）客家人或是閩南的泉州、漳州人都擁有具共通性的合院配置的住宅形態。

〈客家根源與特徵〉也討論了20年前即被臺灣的建築研究者指出，於正身明間的棟木下方，附加不具結構意義的圓木，採用擬似「雙棟」的作法。在中國原鄉地的田野調查裡，除了可確認其在客家

村落裡採用這種「雙棟」的作法外，但同時也出現在非客家村落裡的建築上。有趣的是，在長汀縣城南的賴氏坦園祠客家建築裡，不但具有雙重的「棟木」，其他的「桁櫳」與上下的「椽木」（桷木）也都採雙重作法，這意味其採用了完全的「雙重屋頂」結構。從黃浩所著的《江西民居》可知，雙重屋頂結構普遍存在於贛北地區，當地稱為「五柱九櫳構架」之結構。顯然客家建築的「雙棟」作法就是這種結構構架的遺風。

這種「雙棟」或是「雙層屋頂結構」的作法，在田中淡著書《中國建築史の研究》中，整理了中國第一部字書《爾雅》中的記載，發現在中國周代時期竟已普遍存在雙層屋頂的建築結構。因為這種「雙棟」或「雙層屋頂結構」的出現，可以上溯中國上古時代。考量中國建築自古以來，存在天子、諸侯、士大夫與庶民雖然擁有規模不同，但有共通的空間配置秩序之建築特性。因此，可以推論臺灣普遍存在的三合院建築與中國古代的門闕或是宮殿建築的「冂」字形配置或有關連的配置概念。

關於臺灣與中國之建築間的關係，本書收集了一篇〈臺灣建築的土木結構〉之文章，該文討論臺灣傳統建築結構裡的「內木構外土牆」結構，它表露了中國建築在上古時期南北文化交融的意義。所謂的「內木構外土牆」結構是指砌土牆於木結構外部，將木構架包被在內的結構形態。中國建築史裡稱此種牆為「帷幕牆」。然而有趣的是，北方中國的土牆砌於檐柱之間，檐柱立於厚土牆之中，牆高度僅及於闌額下方。南方則將牆體砌於木結構之外側，形成土牆與木架棟並立的作法。

從考古挖掘出土文物知道，上古時期的黃河流域一帶，存在著所謂「木骨泥牆」之仰韶文化建築遺址，後來發展出木柱立於厚牆中的湖北省黃陂盤龍城建築遺址，及河北省城藁城臺西的商代純土

牆住宅遺址。可知北方屬於土建築結構的建築文化，而「木骨泥牆」就是將檐柱立於土牆中的先例。

相對的，南方普遍存在干欄構式的純木造建築。隨著秦漢以後的政治權力與移民的南遷，夯土版築/土坯砌築技術與作法被帶到南方。根據現存於中國南北各地的建築形態及上古時代的建築遺址，可以推想包括臺灣傳統建築在內的南方中國建築，其結構形態是由原本的穿斗式木造建築，逐漸受到北方傳來的土坯/夯土牆之土結構文化與抬梁式木結構的衝擊，產生出各種木結構與土牆結合的方式。南方木結構也因此發展出「穿斗與抬梁混合的構架」，並在木造建築外圍砌以土坯/夯土牆，發展出該文所謂的「內木構外土牆」的結構形態。而這種「內木構外土牆」結構就是古代中國南北建築文化交互影響之下的產物。

不但前述3本（《台灣の建築》、《臺灣島建築之研究》及《臺灣建築史》）關於臺灣建築史通論性的論著裡，沒有將「佛教建築」的類型獨立出來論述。而且近年來在中國建築史研究領域裡，雖將佛教寺院分有專章敘述，但是嚴格而言，要成為專門的領域仍有待將來的努力。本書也嘗試進行將臺灣佛教建築獨立論述，亦即在第9章〈臺灣佛教的延續〉這篇文章。誠實地說，若要使臺灣佛教建築史的論述得以成立，尚須再加3篇文章：

1. 追溯思辯明末至清代移民在臺灣興建的佛教寺院。
2. 討論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追隨國民黨政府來到臺灣的佛教徒，他們是如何轉化日治延續的佛教建築成為戰後的建築。
3. 討論1980年代以後，由戰後的佛教建築轉化成臺灣近現代的佛教建築的過程，亦即思考關於當代佛教建築的各種課題。

關於早期臺灣佛教建築，先行研究者藤島亥治郎的《台灣の建築》中，將儒教建築作獨立成章敘述，但將道教與佛教的建築放在



一起討論；田中大作的《臺灣島建築之研究》以文教建築歸納孔廟與書院建築，但是將其他數量龐大，所謂的佛教系、儒教系、道教系皆歸於祠廟類別來討論；李乾朗的《臺灣建築史》基本上是按照歷史的分期，但將所有的宗教建築都歸於廟宇建築之類型。另外，民國74年（1985），由公家機關的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撰的《臺灣地區古蹟巡禮》，基本上其對古蹟建築的分類與李氏相同，將當時佔有一半以上的指定古蹟歸於寺廟項下，其寺廟類別包括道教、佛教、儒教建築，甚至包括了陰廟或家祠等建築。

由此可見，不論官方或是民間，常將傳統的臺灣佛教建築與儒教、道教建築規於同一類別。雖然偶爾可以聽聞盛行於當今，所謂的「漢傳佛教」或是「人間佛教」的佛教界人士批評臺灣佛教建築不純粹，常常混雜太多庸俗的裝飾云云。其實中國儒釋道混合的現象，不是明清之後臺灣特有的現象，在從印度的佛教到中國的最初始階段，就已經隱含著儒釋道混為一體的歷史起源。關於這方面的論述，讀者可以另外參考拙著〈初期中國佛教寺院配置的起源與發展〉（收錄釋聖嚴等著，《佛教建築的傳統與創新：2006年法鼓山佛教建築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法鼓山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7，頁13-73），不在此處陳述。

若擴大視野環視東亞、東南亞、甚至整個亞洲，其實不僅中國，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也是神道與佛教不分；於西元紀元之初，傳播至東南亞的印度文化，也是印度教與佛教二者結合成混合體的印度文化。因此臺灣傳統佛教建築的空間內混雜其他宗教特性的情形，不是臺灣獨有的現象，也存在臺灣文化源出的中國，甚至亞洲其他文化圈的不同宗教混雜情形，可以作為今後思考臺灣傳統佛教建築的背景。

在〈臺灣佛教的延續〉文章裡，鑑於臺灣的歷史發展，其統治

政權變化得頻繁，從明鄭、清朝、日本殖民政府，到戰後的國民政府。這些雖都屬於佛教文化圈內的世俗政權，但因民族、地域與時代潮流的不同，各自發展出不同的佛教建築特色。其具有不同特徵的佛教伽藍都出現在臺灣，因此或有機會思考不同的伽藍基層，什麼才是它們共通的特色？本文是探討臺灣傳統佛教寺院建築初期變遷之研究，亦即將焦點聚於佛教傳來臺灣的初始階段，其原有的佛寺或是在日治時期新蓋佛寺的形態，是否存在一定的延續性？

關於該文對案例的選擇，是以日治時期日人對臺灣宗教的分類，以及戰後臺灣佛教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首先選取了臺南開元寺、臺北龍山寺，作為自清代以來純粹佛教寺院與道教化後的世俗佛教寺院之代表。其次在日治時期，在當時臺灣佛教四大門派之說的基礎上，選取了四大門派的祖庭，分析其伽藍創始之初，各寺院之形態選擇與後來的發展。另外，已知清代至日治的臺灣僧侶都前往福建福州鼓山湧泉寺受戒，因此本文也追查了湧泉寺的伽藍配置情形，比較其與臺灣佛教寺院之異同。又因湧泉寺主流屬於禪宗的曹洞宗派，也同具部分的臨濟宗色彩，所以檢驗了日本統治下的日本佛教曹洞宗臺北別院、鎮南臨濟護國禪寺的伽藍配置。

經過對各寺院伽藍配置之歷史發展的追溯後，澄清了部分的歷史事實，發現從清代至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具有下列幾種現象：

1. 以臺南開元寺為代表之臺灣佛教正統之伽藍配置。
2. 由臺北龍山寺代表的道教化「殿堂型」佛教伽藍。
3. 只要是臺灣人主導的寺院新建，即使在日治統治之下，也明確地採用臺灣傳統建築形態。
4. 隨著日本的殖民統治，日本近代佛教伽藍配置也出現在臺灣。

總而言之，雖然在1895年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後，除了開元寺及龍山寺仍堅定地維持臺灣固有的傳統建築樣式與伽藍配置，並

未受日治統治的政治力量的影響。同時代下其他新建的佛教寺院，如靈泉寺與法雲寺，其組織上不但可以獨立於中國佛教系之外，佛教寺院建築之配置也保有了不同於日本佛教建築之純粹臺灣形式的伽藍。這種現象在日本的統治時期，逐漸形成成熟的建築樣式與伽藍配置。

### 0.3.3 清代臺灣的城牆與里坊制

清代臺灣的城牆可視為中國城牆的一部份，是興建在都市周圍的城牆，這與西洋或是日本城堡的「城」不同，而中國都城興建城牆，起始的年代甚早。眾所周知，《考工記》中對於都城的規模與制度有所敘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此指出中國都城圍繞有城牆，在東、西、南、北各方向，各開有3門，共有12門的制度。另一方面從考古遺跡亦可知道在周代諸侯的都城，如魯曲阜、齊臨淄、燕上都與下都、晉新田、趙邯鄲、魏安邑、鄭韓故都、楚郢城、秦雍城、吳闔閭城等城市，雖然不按照《考工記》所規定的制度建城，但都設有城牆則是再清楚不過的歷史事實。

雖然臺灣的城牆之設是承襲中國古代「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的理念，但是在臺灣興建城牆並非十分順利，只因清朝對地處南方海外的臺灣之治理採取消極態度，深怕在地居民據城對抗清朝的中央政府，因而讓臺灣要遲至雍正年間才出現所謂「刺竹城牆」之不完全的城牆形式。也正是因為這種消極態度，間接影響了臺南的傾斜十字街所劃分的里坊制度，這種結果與中國方正的里坊制度不一樣。

論文〈臺灣城牆〉指出，雖然戰後的臺灣研究必須等到1980年代以後，才發現臺灣曾用「刺竹城牆」作為防衛性設施，但在日治



的早期已有人類學者伊能嘉矩在他的著書《台灣文化志》提及這件事。關於臺灣「竹城」的防衛設施，經過後人的研究，其樣態逐漸明朗化。其實，依據《新唐書》、《明史》或是《齊民要術校釋》的記載，知道荊竹適合生長在廣東以南的地域，都有圍繞聚落以荊竹叢，以形成防衛的「竹城」作法，而且歷史文獻也記載安南都護府所在地的越南東京（今河內）等地都植有荊竹作為防衛設施，可見「竹城」的作法並不侷限於臺灣，它是屬於中國南方以至東南亞各地普遍的地域性作法。

就臺灣土造、磚造與石造城牆的整體形態而言，相較於中國國內的設計，要顯得低矮陡峻得多。但是其基本築城工法，例如：夯土版築、或是磚石為表、填土為心等的作法，均傳承自中國的傳統工法。特別是磚石為表、填土為心的磚石城牆，雖然與中國北方正統的築城法稍有差異，但亦是在宋朝之後，因應火藥、火炮等攻城戰術的改變所發展出來的工法。從文獻與實際案例可知，這種磚石城牆大都出現在中國南方，主要原因是南方地勢卑濕、淋雨連綿，土壩難以久立有關。臺灣的自然氣候與中國南方沒有太大的不同，與其採用夯土版築，毋寧採用磚石為表、填土為心要自然多了。

關於城牆上的其他設施，除了清代晚期所興建的臺北府城外，臺灣的城牆所圍起的城市形狀大都趨於不規則形，或因城牆馬面之設已不切實際之用，所以城門樓的臺基亦作為砲臺基礎，雖具軍事功能，但與中國古代懸鼓示警的性質已有不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臺北城牆的水洞結構，其地基的基礎採用木樁基礎。這種木樁基礎也見於中國各地的橋樑墩基，目的在於減少它的沈陷量。

就文章的結論，基於自然環境與歷史背景的特殊性，臺灣的城牆築城工法，有些傳承自中國古老作法的夯土版築法，但是也有僅屬於中國南方以磚石為表、填土為心的磚石城牆。更有甚者因為清

朝政府的禁止築城政策，與考量臺灣適於荊竹成長的自然環境，出現了荊竹圍爲防禦設施，也就是所謂的「竹城」作法。

論文〈新竹城牆〉則相對於〈臺灣城牆〉綜觀全臺的歷史城牆，此文的基本企圖是想要以地域個案檢視城牆之興築過程。在此復原了清代淡水廳城牆的興築過程：在1733年前，似乎以「廟」爲中心的移民聚落已然出現。至於1733年以後的情形，則可按《淡水廳志》的敘述，將淡水廳城的城牆興築歷史分爲四期，即竹城時期、無城時期、土城時期、石城及二重牆時期。對於石城的規模，本論文特別根據歷史文獻與地籍圖，提出在石城牆的規劃者臺灣道孔昭虔，他考量廳級之行政地位與經費的多少，拆毀了440丈（1,408公尺）的竹城與1,440丈（4,608公尺）的土城，改建成860丈（2,752公尺）規模的石城牆。

另外，本論文特別關注刺竹城牆地景形式，因爲竹城是臺灣普遍的城牆地景形式。本文論證如下：

1. 竹城與「民變」及政治的關係。
2. 竹城的形狀與後來臺灣城市的形狀無關，亦即重新檢討所謂的「竹城爲臺灣城原形論」之說。
3. 移民爲了自衛而包圍自然成長的聚落之土圍、土堡，這才是臺灣城市不規則形發展的因果關係。

本文也檢視了各個築城活動的目的與其經費籌組的方式。以結論而言，臺灣築城是爲了自衛，而地方大家族爲了自衛向清皇室提出強烈的築城請願，原先以爲築城之經費可由淡水廳民自由捐獻，但最後則必須用強制的手段徵收不足的經費才得以完成。

關於清代臺灣的里坊規劃，在〈臺南十字街〉論文有詳細的論述。首先分析清代地方志的記載，特別是從康熙33年（1694）至嘉慶12年（1807）之間的臺南市的發展情況，得以重新詮釋過去所認

識的臺南十字街的空間結構。亦即臺南因十字街而將城市區域劃分為東安坊、西定坊、寧南坊、鎮北坊4個坊。從前按照中國城市坊里劃分的習慣，直覺認為十字街為東西與南北兩條大街，其4個坊就是因東西與南北垂直道路所劃出來，位於東北、東南、西南與西北方位的4區域。

但是，實際上在臺南城牆尚未興建之前，臺南即已有東安坊、西定坊、寧南坊、鎮北坊4個坊的存在。換言之，臺南的四坊稱呼，或是按照東、西、南、北的方位稱呼，起自原始的發展階段。若以概念來解釋，稱市鎮中心點的東半邊為東安坊、西半邊為西定坊、南半邊為寧南坊、北半邊為鎮北坊。亦即，若從十字交叉點，往東去的東西大街之南北兩側為東安坊；往西去的東西大街之南北兩側為西定坊；往北去的南北大街之東西兩側為鎮北坊；同樣地，往南邊去的南北大街之東西兩側為寧南坊。也可以說，其四坊的空間區劃先行出現，後來才增設城牆的發展先後秩序所造成的結果。並且，那所謂的東西與南北兩條大街，並不必然是東西南北水平垂直的交叉大街，而是從中心點通向小東門、小南門、小西門及小北門的歪斜十字形大街。

在本章的後半段，討論在日治時期其清代臺南都市空間結構轉化過程。所得到的結果是，日本殖民政府起初是為了陸軍補給的方便，很快地興建了輕便鐵道和臺南車站，後來則依據早先規劃的輕便鐵道的路線與相關設施，改建為縱貫鐵道。並且在統治臺灣之初，即已經為了確保從臺南車站與臺南外港——安平之間的聯繫道路，快速地興建了其間的輕便鐵道，拓寬了西邊幾條包括拆除西城牆的遺址在內，清代即已存在之舊有道路。於明治40年（1907），為要豎立兒玉源太郎總督的銅像，而形成銅像所設立的地點三界壇發展成為臺南的都市中心。明治44年（1911）以後，經由具體的道



路之建設及市廳舍等官方建築的新建，臺南市街的新都市結構與新風貌也逐漸浮現。最後本文再追溯市區改正的先後經緯，修正了過去認為在殖民統治初始階段，即已經擁有所謂的巴洛克街道模型，以進行臺灣市街的改造計畫之說法；也批判了過去無條件地接受日人在臺灣所從事的市區改正事業，直接認為興建西方建築樣式就是臺灣現代化工程之一部分的想法。

### 0.3.4 傳統店屋與臺灣鄉村市鎮形成的原理

關於臺灣的建築與都市史的研究，店屋建築是能夠引起國際學者興趣的課題之一。難能可貴的是，在臺灣的現代都市的建設，也多少繼承了傳統的店屋建築的空間配置與都市紋理，它在組成具有臺灣風格的都市空間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在編撰本書時，新撰的「臺灣店屋的歷史」，增補過去的資料與想法。該文指出最早注意到臺灣「店屋」建築者，應是日治時期的人文地理學者富田芳郎，他在〈台灣街の研究〉論文裡指出臺灣存在市街家屋（urban house）與村落家屋（rural house）兩種家屋建築，前者就是本文所稱的店屋建築。他指出臺灣的市街家屋隨著日治時期街道的規劃與改建，正好可以依據年代的前後，將其歸類為明治期、大正期與昭和期的街屋建築。但是就居住於都市內的機能或是建築所在的基地形狀而言，臺灣店屋並非是世界上獨特的都市建築樣式，在各地其實存在不同建築形態與建築結構的都市住宅。

關於店屋的研究，戰後雖然中斷過一段時間，然而很快地又受到臺灣建築史學界的重視。特別是在漢寶德於民國66年（1977）6月至67年2月所主持的「鹿港古風貌之研究」之後，店屋建築受到學術界熱烈的討論。在研究的性質上，郭中端與堀込憲二在《中國人の街づくり》（相模書局，1980）指出了臺灣亭仔腳廊道之出現，

與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所實施的都市計畫法令與政策有很密切的關係。在1983年，由臺灣大學夏鑄九與黃羅財所完成的《臺灣傳統長形連棟式店舖住宅之研究》，讓店屋研究又再次掀起熱潮。近年來亦有研究者持續關心這個課題，也出現了碩士論文（蔡巨騏的《閩南「手巾寮」街屋空間構成之比較研究——以福建泉州與臺灣鹿港為例》）開始比較臺灣與泉州的店屋建築，但大都屬於建築計畫學的研究領域，少有建築史觀點的討論。

除了臺灣學者的研究之外，日人泉田英雄與黃俊銘曾在日本建築學會上，發表過相關課題的系列性論文，他們證實了英國殖民政府在麻六甲、檳城、新加坡與香港等處導入近代都市計畫手法與法令，後來這種都市規劃方法被引入中國南方各都市。泉田氏等人的論點確實對臺灣的研究者造成震撼，就目前所知道的研究狀況，中國與臺灣很少遺留有早過20世紀以前的實存店屋，而新加坡的店屋卻是1822年前後經過西方都市計畫手法建造出來的建築，也因此讓新加坡的城鎮具有整齊劃一的店屋建築群。這種觀點讓支持店屋建築起源於中國南方的人感到不解。

另一方面，由店屋的建築形態所組構的市鎮空間，如新北市三峽、桃園大溪或是新竹縣湖口等的古老市鎮街道，予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由道路兩旁的亭仔腳步道與連續立面所形塑的街道空間。然而這種街道空間到底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發展成形的？這個亭仔腳步道與店屋立面的形態，可以由前述富田芳郎指稱的街屋三時期來作歷史的分期。關於這點，1983年李乾朗在富田芳郎之後，再度指出因日人的市區改正事業的施行，讓傳統街屋開始發生了立面的問題。

進一步延伸，為何在進入日治施行市區改正的短短幾年之內，臺灣的傳統店屋與街道就能產生出幾近完全不同的街道空間呢？這種傳統市鎮的街道空間真是臺灣獨有的嗎？近年來關於近代都市的

研究，逐漸發現這種具有立面與亭仔腳的細長條形「店屋」是超地域的市鎮住宅建築。如今必須擴大地理及時間的範圍，甚至將臺灣的市街發展放到世界的都市計畫脈絡裡，才能更清楚臺灣店屋建築物群的歷史意義與建築特質。

換言之，店屋的研究可以收斂於兩個議題上，一是其內部空間配置的起源、發展與演變，另一則是附屬於前面緊鄰道路兩旁的亭仔腳步道之文化因子問題的探討，而它又是經由何種過程普遍存在於臺灣各地市鎮。關於空間的配置，就如林衡道在《臺灣勝蹟採訪冊》第2輯中，提出臺灣店屋的平面從「清代後期型」發展至「日治初期型」，夏鑄九在《臺北的老商店簡述》（《竟與象》，1972）中，指出「早期唐山影響的平面」到「後期番邊的影響平面」，但就如關華山所言，這些說法雖是合理的推測，但是缺乏歷史證據之佐證。

關於亭仔腳的設置，除了郭中端與堀込憲二的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法令說之外，黃俊銘卻指出在1887年劉銘傳興建臺北城時，已存在有關亭仔腳設置的相關規定，因此可知附設亭子腳的都市景觀之出現，並不完全僅仰賴日人所制訂的都市建築法規，並且其出現的時間可上推至日治前的19世紀末。進一步言之，就如該文所述，即使在臺灣建築原鄉的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其對店屋的研究也才剛起步，歷史材料的收集也並不完備，現今臺灣因為留有完整的清代地方志與日治時期有系統的土地調查資料，雖然其中沒有直接觸及店屋，但若配合現存的店屋建築，相互為證，仍然可以清晰推知臺灣店屋在18世紀前半就已經存在了。

近年來關於店屋，已有如蔡亘騏進行福建泉州與臺灣鹿港的比較研究，亦有許多學者開始對分布於東南亞的店屋進行觀察與分析，研究環境已與在1970年代後半葉的鹿港市街研究時的情況大不相同，得以用更寬廣的視野來討論臺灣店屋的文化特質。例如日本



在1895年據有臺灣之後，立即對臺灣的傳統店屋進行改造，並且頒布關於臺灣市鎮建設的法令規章，儼然背後存在改造臺灣市鎮建築的理想藍圖。追溯其背景，日本早在19世紀後半，即已積極導入英國及法國的都市改造觀念與技術，也就是採用歷史主義樣式的都市建築空間裝飾手法改造日本的都市結構與都市風貌。他們甚至將其視為追求近代化、西方化的重要象徵，不但用在國內，也隨著殖民地的經營，這種手法也被應用於殖民地的都市改造工作上。可以推測，日本對臺灣都市的市區改正、設置沿街兩旁的亭仔腳及街景的形塑模仿英國在新加坡與香港的都市建設。

日本施行近代都市改造政策於臺灣，而於20世紀初期，包括中國境內各地的地方政府，則為追求都市的現代化建設，自主性地追求整齊劃一的街景及設置街道兩旁的步道，將其視為近代都市的形態。如中國的廣州、汕頭、廈門、漳州等地，都是在同樣都市計畫概念與手法下的時代產物。臺灣在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其都市改造方法並不是單一的特例，這也不是日本自身發展出來的都市改革的手法，其應被視為世界各地都市改造方法的一環。

另外一篇關於臺灣街鎮形成歷史的文章，也是本書最後一篇文章〈永平街的故事〉。本文的書寫方式與其他各個章節不同，儘管文中也涉及不少地震後所進行的重建工程之複雜糾葛，但是該文揭露了在臺灣可能普遍存在的市街地共有問題。為讓問題的複雜性與重要性能夠更生動的呈顯，本文並沒有改變文章的書寫方式，或者讀者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研讀臺灣市鎮的形成史。地震震開了埋藏於南投縣中寮鄉永平街地下近百年的土地共有故事。

檢閱明治37年（1904）《二萬分一臺灣堡圖》與昭和2年（1927）《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可知鄉親寮（當今的中寮鄉永平村一帶）在清朝時期就已出現，但其位置是在現今中寮國小右前方，稱為

「庄底」的地方。進一步解讀日治時期的《土地臺帳》、《土地登記簿》、《土地連名簿》以及戰後從民國36年（1947）6月起所編造的《土地登記總簿》、《共有人名簿》和民國87年（1998）以前數位電子化前的《土地登記簿》，可以還原土地分割前的完整地號之土地形狀。可以知道永平路是在大正4-5年（1915-1916）前後所開闢，也因道路之出現而將土地分割成南北兩部份。因為土地資料繁雜而龐大，本文僅能以該區塊土地之中的單一地號，亦即319地號土地為例進行討論。可發現當時的319號是由單一所有者所擁有，但是其他的地號之土地已開始因血親繼承而產生共有的現象。

到了昭和4年（1929），因為緊鄰道路兩旁的土地地目已被改為「建築敷地」，也可以看到土地作進一步的分割，但離道路較遠的土地則仍保持為「田地」之地目。可知永平老街是在昭和4年以後才形成的市鎮，這自然與《臺灣堡圖》與《臺灣地形圖》所載的內容相符。在昭和10年（1935）以後，又因為永平老街上的居民與明治製糖株式會社、或是中寮庄購買信用組合、三井合名株式會社之間有土地的買賣行為發生，也因此作了更進一步的土地分割。就中寮的發展史而言，因原來的天然資源而發展製腦業，後因日人殖民統治政策的導入，出現了製糖與香蕉產業。也因此吸引了包括相當比例的客家人在內的周邊移民前來開墾，在大正、昭和時期移居聚集中寮一帶，促成了中寮市鎮的發展。根據居民的訪談，可知當時因為土地價格便宜，僅付少許租金落腳於中寮地區，但也有相當大比例是未定居的移動勞工。他們先租地蓋房舍，待有經濟剩餘之後，才逐漸買斷土地所有權，興建自己的家屋。

在這樣的情況下，住民也逐漸聚集，中寮永平老街的街貌也慢慢成形。根據土地登記簿資料，可知到了戰後，異姓居民逐漸向地主買地。或因地政業務的滯慢，抑或其他原因，雖然不同的個人獲

得了所有權，但土地物卻沒有分割，而採取登記共有的形式擁有土地。但是在「互相承認彼此各自在『真實世界』裡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位置與範圍」之下，尚能「相安無事」。這種習慣，即使在民國64年（1975）6月20日，因為實施都市平均地權，臺灣全體的土地所有權徑為分割登記時，也被有意無意的沿用下去，竟然也未對「土地物」進行分割。擁有大宗土地持份的中寮鄉農會，在土地物無法分割清楚的狀態下，又亟欲對自己所擁有的土地作更有效的自由支配，他們積極的應用「互相承認彼此各自在『真實世界』裡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位置與範圍」之默契，分割出319-4、319-5、319-6的土地來。雖然土地所有權仍是共有，但已經可自由的使用與買賣，甚至在地籍圖上竟也能標示出這3塊土地的位置與範圍出來。

但在土地所有關係複雜的情況下，自然其土地糾紛亦容易發生；這在《土地臺帳》等地籍資料裡亦可以得到證明。因土地糾紛而提起的法律訴訟，訴諸公權力的協助，結果也無法解決錯綜複雜的土地問題。居民必須「互相承認」彼此的權利，才能「相安無事」，也因為如此，過去政府沒有對這種土地問題處理。一旦在1999年發生地震之後，在其法定土地資料不清楚的情況下，在「真實世界」裡作為「互相承認」依據的建築物實體又遭損毀，因此造成了災後重建的大混亂。本文所整理出來的「互相承認彼此各自在『真實世界』裡的土地使用權及其位置與範圍」之默契，表明了臺灣鄉村地區的市鎮仍然存在土地共有原則，這或許是臺灣市鎮發展的根本原理所在。